

目 录

之一 放大镜和显微镜下的魔幻世界（我中有他）	1
序曲	1
我心中的上海昆明二重奏	5
一个缄默的人——阿辽沙	6
第二次大学毕业后	9
在“模糊”中度过的时日	11
半夜省教育厅里再次为我而响的电话铃	18
好事多磨	20
苦涩的重逢——上海情未了	23
发展了的“三段理论”	26
到杭州疗养——共同做梦的端倪	30
悬崖上的“鸟巢”——梦和梦魇	39
老资本家和“人民警察”	41
“内控分子”——向文化大革命致谢	45
“内控分子”大闹“天宫”	48
轮到我了	55
“抗大连队”	67
“重蹈覆辙”的耐人寻味	76
花花世界中评职称	82
对“两案”的叛逆和对“收获”的喜悦	90
告别讲台前夕浅谈“教”与“学”	93
退休后和外出旅游——涤荡心灵的“梦游”	95
这就是人生！	99
归去来兮	111
之二 一个革命者的蒙太奇（他中有我）	121
引子与回旋曲	121
可怕的回忆记录	124
“精神病患者”	126

第二次上大学	128
一个超前的文艺个体户——自由职业者	136
不端铁饭碗受尽歧视和贫困	139
文革前的一个深夜	143
哀怨的大串联	145
梦寐以求——要求一个属国家单位的固定工作	153
文革后两次出游	158
搬家和迁户口事件中发现的“鬼”	172
错过了的春风	176
分房的得失背后	182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85
谢幕呓语——墓中致妻信	190
附录一 逝者如斯——慰问信	193
附录二 一个坚强不屈的文学翻译家——非琴	210
附录三 笔下结晶——非琴的作品	218
附录四 团结问题	226
附录五 潘知云当初无处可交的党员转关系的介绍信	235
附录六 李庆云给中共昆山市纪委审理室的信（底稿）	235
平静的补白	239

之一 放大镜和显微镜下的魔幻世界（我中有他）

序曲

思想改造运动中“邂逅”特权者的感悟

从《淡蓝色的梦》中醒来后，我自认为生活已把我锻炼得现实了，即使有时难免也会做梦，但这些梦已不大有色彩，也不那么富于幻想和多愁善感，更谈不上浪漫和刻骨铭心，似乎醒来后就会把梦境忘得一干二净。我早已领悟到人生的难以捉摸，但毕竟解放前夕的我才不过是一个仅有二十来年人生经历的青年……

卢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是在 1949 年 12 月上旬。人们欢欣鼓舞地奔上街头，欢呼雀跃。是的，失掉民心的反动统治终于结束了。我也和大家一样，说不出的兴奋，因为我想，我多年朝不保夕的生活大概也快结束了。虽然当时我仍处于失业中。外文系毕业后因毕业生不能再住在学校里，算我动得出脑筋，以转中文系再深造为借口仍住学校女生宿舍里，暂时有了个栖身处。但这并未妨碍我这个无家可归者对未来的再次憧憬，因为那支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我们在解放前已多少次高声歌唱过。我虽不知解放区的情况，仅以我个人面临的生计问题，我早已听说，解放区里没人饿饭……

然而当时卢汉是和平起义，解放军正规部队尚未来得及开到云南。国民党反动残余部队仍在负隅顽抗，虽然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护厂护校，但一切都处于无序状态中。所有学校直到 1950 年夏天才准备开学上课。各校忙于聘请教师，由好友张崇基的介绍，我应聘为天南中学英语教师。天南中学是美国圣公会办的一所有一定知名度的教会学校，原本英语课全由外国牧师担任，听说共产党打过来都跑了。我到那里时只剩下一个安牧师教高三英语，其他班级，从初一到高二的英语课由我一人担任。不久教育厅派工作组来接管。我是全校最年轻的教师，是依靠力量。教师大部分是新聘请来的，有几位看上去很“革命”：身穿列宁装式的破旧制服，冬天破棉袄身上一披，也不知他们临时打哪儿弄来的这种“时装”，讲起话来满口新名词；相形之下，我

显得很“进步”：穿的是在“桃源课堂”教书时用“丰厚”的薪水购置的那套惟一的时装，虽然还算新，但已不“入时”。谈吐中没新名词（还没学到），因此被上述几位“革命者”认为，我是一个资产阶级小姐。幸好两年后，在大中学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尚未结束时，我就被调往上海俄专（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前身，现改名外语大学）带工资学俄文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民党留下偌大一个烂摊子，各方面需要建设，要向苏联学习，那时只有向苏联学习，因为欧美各国不承认新中国，封锁我们。需要俄语人材，对那时的学俄语者来说，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大气候不允许学俄语，因怕被赤化。所以解放后太需要俄语了。我已向领导表示一定努力学好这一迫切需要的语言工具以报效祖国。因是带全工资学习，这与我解放前自供自读大学，还要为吃饭问题发愁，确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当时从昆明到上海无直达火车，要先乘汽车到广西金城江才有火车到上海。从昆明出发整整九天才颠簸到上海。不能忘记汽车爬贵州高山七十二拐弯的情景：爬到高处往下俯视时会让人感到阵阵眩晕的惶悚。下面山道上的辆辆汽车似未上足发条的小玩具车歪歪扭扭地蠕动着；往上仰望时好像上面的汽车在直立地向上爬，我真担心上面山道上的车爬不动时会掉下撞到我们的汽车上，还要拐七十二个弯！有时汽车是在穿云驾雾中摸索着，山道又狭窄，整天耳边只有汽车费力地往上爬的“唬！唬！唬！”声。听车上的常客说，这些车都是国民党留下的该报废的车，所以爬起来更吃力，常有因爬不动滚下山的事发生。然而我们这十几个未来的俄语同学并未因此感到畏惧。一路上互相关心照顾着，这使我感到新人际关系的一丝温暖。有时真的不敢往上观也不敢往下看，只好邻座之间聊聊以熬过白天的时间，挨到晚上在旅店里又难逃臭虫的骚扰。不过由于对前途的美好憧憬，一点也不在乎这些区区小事。

记得在路上我们的带队者，十几人中惟一的党员对我抱怨说：“李庆云，全因你，我们几个住教育厅的人昨夜一直未睡好。深更半夜电

话铃声大作，这铃声是为你而响的！”他接着说：“打电话的人有点来头，一定要厅领导亲自接电话，说要把一名叫李庆云的赴沪学俄文者留下。当得知档案材料户口均已转上海后，对方才无可奈何地挂上电话。”最后这位同窗似乎有点得意地说：“你差点走不了了！”同时又有点为他告知我这秘密很自得似的。最后他笑了笑打了个哈欠说：“真疲倦哟！”

我心里明白这是谁打来的电话：

大中学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省里一位官儿给我们作过几次报告，我听报告不大专心，常常在下面和邻座的熟人悄悄讲话，想不到这竟引起这位人物的注意，也不知他怎样知道我的名字的，第一次他找到我办公室谈话，我以为他要训我不听他作报告哩！然而想不到是要我把我的思想小结抄三份交给他。我的思想小结主要是“批判”（学着批）自我奋斗读大学时的

清高和看破红尘的思想。我想，大概是我的思想小结比较典型，所以要一式三份作为重点批判。我忐忑不安，并在每份上又加上一句“听报告时不专心”的自我批评（才学会不久的新名词）。第二次他又找到他的办公室单独谈话，他告知我“小结”已交省委组织部。我听了吓了一跳，心想事情闹大了。但他却和气地详细问及我的一切，边问边从桌上一盘苹果中拿了一个大的削好皮后递给我。当时苹果在昆明是稀罕的，因那时云南不种植也买不到苹果。看来不像是对一个思想问题严重者应有的态度，这使我紧张的心情渐渐缓和下来。然后他继续问及我个人的“私事”，问我与小结中交代的那位海外男同学之间的关系到何等程度。得知我的回答后他说，今后填表和写交代中没必要写这种海外关系。我当即天真地反问：

“你们个个领导作报告时不是一再强调，交代一切，尤其海外关系，都要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彻底吗？”

他笑了笑说：

“像你这样二十岁多点的女青年有多少豆子好倒？”

“我们报告中针对的不是你这样的人。”他继续说。

“那我怎么晓得呢？”我说。

他还启发我说：“新旧社会的对比对你更有深刻的感受，你应该更爱中国共产党，并争取入党，你尽快打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我……”之后，想不到他却自己主动作起自我介绍来：

××省人，今年三十二岁，大学三年级未读完就参加革命去打游击，所以城市生活经历不多，文化程度不高很遗憾，故想从某方面得到文化提高的帮助……接下去他就“开门见山”了。此时我已嗅出谈话的目的。本想立刻告退但又觉不恭。我已知当时大干部们找女大学生已成时尚。我的好几位大学同学就是这样被突击成为高官太太后，立即入党当上工厂和学校的党委书记及科协党组和妇联的领导的。其中的一位读书时不好好学习，只专心打扮，连“读书报告”都是利用追她的男生代写。她们解放前大多不会去读《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大众哲学》……对政治比我还无知。不知她们如何当领导的？而我，坦率地告知这位大官，这种方式不能接受，彼此毫不了解地突如其来。他却大度地表示不勉强。不过后来却又有另一位领导来做我的工作说，要了解还不容易，他参加革命后的多次鉴定比任何了解都彻底，要我好好再考虑考虑，并检查和批判我头脑中花前月下的小资产阶级的恋爱观。然而我尚未来得及考虑如何批判和检查时，就从这位官儿的眼皮底下“溜”走了。我为我自己庆幸，因为不论在新旧社会我从未想过要当官太太，即使在旧社会我已处于饿饭的时候，也没想过今后要过“夫荣妻贵”的生活，我一心只想以自己的本事出人头地。

“溜”走了，怪他消息不灵通，不知教育厅早就定下我是到上海学俄文的一员。我感到庆幸的同时，内心深处产生了一个疑问：难道解放后也能利用职权达到私人目的？这困惑不算大，但却是解放后第一次的一个小小问号，它一直深藏我心底，只是在再次的天真中多长了一点“心眼儿”。

我心中的上海昆明二重奏

我终于到了上海，开始了我的第二次大学生活。我对前途再次看到希望，虽不是第一次大学时想像的“前程似锦”，起码不会像那时暗淡，我憧憬着光明的未来，因而忘我地努力学习。

由于我有英语和法语的基础（法语是读英语专业时的第二外语），我和不会说一句中国话的苏联教师可以用刚学会不多点的俄文夹杂英法文交谈自如。一进校就当上了俄文班长，我们那位带队的党员当政治班长。我成了一名学生助教，因为我们真正的助教是解放后西南部队俄专突击培养出来的，口语听力都不行，往往上课时他“退居二线”站立一旁，我却在苏联教师身边和她一起给同学上课。同学们叫我“阿希斯简特卡（女助教）”。第二学期我调到另一个进度较快的班级，不担任任何职务，一心理头学习。这班的教师叫娜塔莎，她不愿我们呼她的全名，所以现已忘了她的姓。这是一位有一定文学修养的中年女教师。我调这个班不久，她对我这个她曾担心会赶不上她班上进度的新来者十分欣赏；不论课堂回答问题或复述课文时，常常得到她连声的“喔青哈拉朔（很好）”，引得同学中不少人不小的妒嫉。幸好他们没看到我练习本上那么多的“奥特里契诺（好极了）”哩，否则我的日子会不好过的，因为这个班的学员大都曾是英语教师。只有一次女教师把我的一篇作文在班上朗读了，她感情丰富地读完后，笑眯眯地看着我连连说了好几个“喔青哈拉朔！”“奥特里契诺！”作文是写昆明的，写那儿风和日丽的宜人气候，迷人的自然风光，蓝天白云下四季花香飘的美景，写这城市的宁静和人与人之间的纯真感情……想不到教师对我的作文和对昆明产生了那么好的印象。一下课，一位男同学就对我说：“能让我拜读拜读得到那么高度赞扬的大作吗？”不经我同意，他就把我的练习本拿去了。看过后他像是不以为然地把练习本还给我，一句话也没说。对此，我也很不以为然。

记得当初我们十几个从云南来的学员因路途遥远，又参加了一段时期的思想改造运动，到上海已是1952年10月中旬，学校开学上课已四周。于是我们和福建最后一批报到的二十多个统考生编成一个班

即匆匆上课了。虽说是从俄文字母学起，但很快就进入读短篇课文和语法课。这对我来说是很轻松的，虽然班上几乎所有学生都感到很吃力。其实我对学习进度感到很不满足，但作为俄文班长，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帮助同学的学习上了。尤其对学习困难的同学，我花的时间比我自己的学习时间还多。那时帮助学习困难的学生也实行包干制，真不知浪费了我多少时间和精力，但仍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我对这种包干制有看法，但又不能说出来。不过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我自由了。因此逛逛大上海，遛遛名闻遐迩的南京东路，到大电影院和大剧院看电影看戏……虽说上海是远东最大的大都市，说真话，我却一点也不喜欢它。我不习惯这城市的喧嚣，受不了这儿夏天的酷暑和冬天的严寒；天空老是灰蒙蒙的，像一块用旧了的抹布说不出是什么颜色，看不到阳光灿烂的万里晴空和群星闪烁的莫测天穹；还有那令人难以忍受的黄霉天：多少天阴雨不断，潮湿、闷热、气压低得呼吸不畅，到处发出霉味……什么三伏天、秋老虎、进九我都不懂，对于被四季如春的昆明宠坏的我来说实在难熬。相比之下，我更思念昆明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及神秘的星空，想念那儿令人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色，以及被外国人称之为“东方瑞士”的小城市……这也是我写那篇作文时的思想感情。

我多想尽快离开这个我不喜欢的大都市！但我们被派来学习的时间是三年。我多希望三年快过去，我就又能回到美丽而宁静的小城昆明。同时我也感到时光会很快流逝，必须好好把握，因此更抓紧时间加倍努力学习。

一个缄默的人——阿辽沙

为了提高口语，我和苏联教师及专家广交朋友。由于我是带全工资学习，我有经济能力请她们去看戏、听音乐、吃风味小食……她们对京剧和越剧特别感兴趣，对戏装倍加赞赏。看戏时我抓紧时间练口语——向她们讲解剧情和人物对话及唱腔的大致内容。因为要充当翻译，所以我请客看戏时最多左右各一位，多了照顾不过来，最好只有一位。她们要上街购物或缝制服装就来找我陪。她们也带我去苏联驻

沪总领馆看原版电影，品尝俄罗斯风味。在学校里常能看到我和她们出出进进谈笑风生，引得口语不好的同学颇为羡慕，从而在学校中有点小名气。

奥尔洛娃是一位四十多岁的苏联教师。她对去她住处练口语的中国学生和助教热情接待，有时甚至忙得饭都忘了吃。她没教过我，但我听说了她的热情后，就要她班上的一女同学温亲敏（我第一学期的同桌）带我去认识了她。在不断的交往中，我和奥尔洛娃成了好友，而她却开玩笑地称我为“多契卡（女儿）”，她说她只有一个十六岁的儿子，想要一个女儿。

在奥尔洛娃处我常见到一位男士，说他是学生吧却比统考学生大几岁，助教又不像，不够活络，因为我从未听到他说过一句中文或俄文，也从不跟别人打招呼或交谈，只是默默地含笑坐着听我们在座的人叽哩哇啦地用俄文乱讲。他坐上约莫个把钟头后站起来向奥尔洛娃点点头，好不容易似地吐出一个词“多斯维达尼亚（再见）”，即匆匆离去。每次他走后，奥尔洛娃总带点遗憾的口气说，“毛尔恰利尼克（缄默的人）”。有一次我好奇地问她，这是个什么人。她说，是一个比我低一级的学生，这学生进校时就已能阅读俄文版的《真理报》和一些文学作品了，只因是自学，初进校时发音不准，现在已改正得差不多了，只是难得开口。他的同学说，他总是沉默寡言，中文口语也不多。她还告诉我，她常用俄语故意问他一些问题，想以此逼他多开开口讲讲俄文，然而越逼他越讲不出话，没法！她又叹息地说“比埃德内依（可怜的）”！性格外向的我，对这种性格很是难以理解。有一次我对她说，他来既是为了练口语，为什么总是像鱼一样的沉默（俄文中有这样的比喻），那么他来这儿只能练听力了。以后我和奥尔洛娃私下谈到他时就称他“雷巴（鱼）”。后来她告诉我，他的俄文名字叫阿辽沙，他来她这儿是请她修改他用俄文写的文章，他的俄文文章写得很好。后来我又听他班上的同学说，阿辽沙的笔头不论中俄文都很棒，还说他用俄文写的诗得到他的任课教师格列波娃的很高赞赏，认为可以相当于苏联十年制的学校高年级学生的水平。不久又听

说，他译的一篇苏联著名散文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夜行的驿车》已在 1955 年第 10 期《译文》上发表。按时间算，那时他才只是二年级下学期，不过当时他已离开俄专到西安了。我找来该期的《译文》，读后对他肃然起敬，对他译文的流畅、用词的优美和熟练很是佩服。再说，这期上的译者都是些大译家，如戈宝权、吕叔湘、李芒、草婴……原来这位被奥尔洛娃和我称为阿辽沙的人真不简单！那时苏联教师们都给每个学生取个俄文名字，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的名字太难记，对他们来说，好像所有的中国人名都差不多，后面总带一个“H”。取了俄文名字他们就容易记住学生了，这对教学有利。我的俄文名字叫莉达，是我请一位教我的较年长的苏联男教师取的。他很高兴我请他取名，慎重考虑了好几天才决定“莉达”，他认为莉达的“莉”和我的“李”同音，也不失去我本来的姓。

有一次我请奥尔洛娃听音乐，她一定要我请上她的阿辽沙，她说让我帮他多讲讲话，我不便拒绝。音乐会开始前，我用俄文问他的中文尊姓大名，他用中文回答我“潘痴云”，然后解释三点水的“潘”，痴呆的“痴”，最后想了一下说：“云就是和你一样的那个‘云’。”不知为什么，说完他很不自在。我呢，对人名中取个“痴”很觉怪，真觉有趣，差点笑出来。

在我上三年级时的上学期，奥尔洛娃回国了。这之后我和这位阿辽沙也就没见面的机会了。只是有一天我匆匆上楼时，被他班上一个男同学叫住问：

“你知道潘痴云退学走了吗？”

“谁？”我问。

“阿辽沙。”他说。

我因急于上课就没多问，但听这同学的口气中带有很惋惜的味道。而我当时想，他的程度已能翻译纯文学作品了还在这儿磨什么洋工。从此阿辽沙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只是 1956 年以后，在几乎每一期的《译文》（后改为《世界文学》）上都能见到他的翻译作品，仍用译《夜行的驿车》时的那个笔名——“非琴”。

第二次大学毕业后

三年很快过去了，我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带着对前途的无限憧憬，我和一起来的十几个同学又踏上颠簸的回昆行程。一路上大家没有了来时的那个兴奋劲儿，似乎各人都有满腹心事，也许是在担心回去后的工作分配吧。说真的，圆满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恐怕只有那么一二人，而我在这些人中学习成绩可是名列前茅的。我想一定会把我分配到最需要俄文的地方去，我没有工作分配上的心事。在火车上我回忆着三年来的学习生活，这是我自十八岁成人后，一生中最快乐最得意的三年，我无忧无虑一心努力学习。想到三年后回到昆明就不大可能再千里迢迢到上海来，早听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抓紧假期外出旅游：苏州、杭州、无锡、南京……然而江南风光并未让我感到有特别的魅力，太多的人工“雕琢”，就像长得还不错的姑娘搽脂抹粉地打扮反而破坏了她的天然美一样。论自然风光，不如云南那儿的原始的粗犷、壮丽、雄伟、秀美……这决不是“人人都说俺家乡好”的狭隘情感，而是云南的立体气候形成了多种独特的自然风光，否则今天老外们也不会为到过云南旅游而骄傲了。大理的苍山洱海、澄江的抚仙湖、路南的石林、建水的燕子洞（亚洲第一大溶洞）、西双版纳的热带风光、金沙江畔的虎跳峡、丽江的玉龙雪山，石林的大瀑布、下关的鸡足山、武定的狮子山，太多太多数不清了。

在上海的三年，我把工资全花在和苏联教师交朋友、买书及旅游上，所以回去时没有像同来的女同学们那样，箱子里装满了上海时装。我从未想过我要留在上海，也从未考虑过会在上海或昆明以外成家，故我放弃了那些愿意和我“谈朋友”的人，其中不乏那个时代的“红人”和“宠儿”。

别了，大上海！永别了，我毫不留恋的大都市！

终于回到日夜思念的昆明等待分配。分配名单下来后出乎我的意外，到高等学府和重要单位的都是党团员！学习再差也没关系。再就是原来由昆明派出的仍留昆明，而我这个由昆明派去的却被分到离昆明不近的楚雄县。谁让我不求“上进”入党，入团，却仍是个“群众”呢？！

服从分配是当时评价一个人组织性的惟一标准。我只好去了楚雄，反之比之解放前，至少我生活有保障，再说我也热爱教学工作。

由于归程中在贵阳时，同窗们一定要我同去品尝贵州风味的米线，那种辣真叫人至今想起仍可怕，我只吃了几口就不敢领教而去买饼充饥，却仍被辣出急性肠炎，拉肚子一直到回昆明仍未愈，且越拉越厉害，所以到楚雄中学报到时迟了二周。报到第二天就开始上课。据说原来的俄文教师有问题，正被隔离审查，所以全校六个班，从初一到高二的 24 节俄文课由我一人担任，每天上午四小时全部排满课，星期六下午还要上四节英语课，共 28 个课时。英语课是为上一级高三学英语的休学者开的。除上课外还要备课、改本子、抽空为个别学生辅导、开会，课余时间学生兴致勃勃地来找我教唱俄文歌，“卡秋莎”、“青年团员之歌”、“红莓花儿开”、“在远方”……我和学生打成一片，这是我教学中的一贯作风，师生关系融洽，这儿的学生比昆明的更纯朴，我喜欢他们。不过由于从上海回昆明十天路程颠簸；加上在贵阳吃风味辣出来的急性肠炎拉了十多天肚子，报到后又忙于 28 节课，人感到有点累，但当时年轻也挺得住。楚雄中学的校址是在当地最大的一座破庙里，教师宿舍就是一进门的两边厢房。虽说一人一间，但仅半板之隔。一向睡眠不好的我，对隔壁两邻居的动静一清二楚：打鼾声、翻身时床发出的咯吱咯吱声、梦话声、咳嗽声……甚至隔壁的一声喷嚏都会把我吓醒。我每天夜里能睡上四个钟头就感到满足了。这大概是我第一次自供自读大学时锻炼出来的。

到楚雄中学报到后，在忙忙碌碌中转眼期终考临近，我忙于给学生复习功课，出期考试卷。单试卷就要出内容各异的七份，我每天夜里几乎要忙到一二点钟才能躺下睡觉。我感到眼睛视物有些模糊，把这现象归罪于煤油灯，因为学校是用小发电机自己发电照明的，那电灯泡有时简直就像一只烧红了的煤球吊在纸糊的顶棚上，何况十点钟电灯就统一熄灭了，因此学校又给每位教师发一盏煤油灯做补充。我坚持到改完所有的考卷评好分，只等将分数填入成绩表格里，干完后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可是坏了，那天不知怎的，我总看不清表上的

格子，我像往常一样眨眨眼闭上又睁开，可一连几次都不能像以前感到眼睛模糊时，眨眨又睁开就好些。任我眨多少次，眼前那张表格仍只是一片白纸。于是我干脆躺下睡觉，心想可能休息一夜就会好些。但夜里我一直未能入睡，几次把夜光表凑到眼前都看不清几点钟，这时我才开始紧张起来。“要瞎了！”一阵心跳厉害，我在惶惑不安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天一亮我赶紧起来看那张表格，但仍是一张没有线条的白纸！上班时我急忙去找校长告知情况，他要我到卫生院去看看，这是我第一次“光临”这儿的卫生院，是问着路“瞎摸”去的。医生要我裸眼看视力表，天哪！戴着眼镜都看不见视力表上的任何一个符号！他说卫生院设备简陋，没有检查眼底的仪器，所以他只能让病人看看视力表，开点药，其他就无能为力了。他建议我假期到昆明昆华医院去诊治，然后开了维生素 A 和 B1 给我。

在“模糊”中度过的时日

（一）见小官——第一次发犟脾气

回到学校我向校长说了情况，并表示要趁寒假到昆明去诊治。校长面有难色说，要经地委批准才能到昆明。我很不理解为何假期还需请假。但我吃过中饭后还是去了地委。我问到了文教科就急急忙忙走进去。那里坐着一个年纪不大的好像干部模样的人，因为他身披列宁式的棉袄，这是地道的游击作风干部的“打扮”。他翘着二郎腿，叼着一支香烟，傲慢地问：

“你找谁？干什么？”

“校长要我来地委请假到昆明看眼病。”我回答。

我以为他会问问我的眼怎么啦。谁知他却劈头回答说：

“不行！”

我心想，你这小官僚，还不知我的眼出了什么毛病就那么武断地吐出“不行”二字。但我又想，这小城就是一个“小王国”，这里风吹草动，一下都会知道的，说不定上午校长已和他们通过电话了呢。于是我耐着性子问：

“放假了怎么还需请假？”

“这是组织原则！”

这意外飞出的一顶“大帽子”并未吓着我。

“假期是国家规定属于教师自己支配的假日。”我不客气地回答。然后又加了一句：

“你们不批准，我也有权走。”

“那你就走走看！”他怒气冲冲地说。

看他的态度这么蛮横，惹得我解放后第一次发了我的犟脾气：

“走就走！”我毫不退让地说。

大概这也出乎他的所料，因那时在这些人眼里，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只有服服帖帖听摆布。也大概还没人这么大胆顶撞过他。他火了，气急败坏带着威胁的口气说：

“工资不发给你，更重要的是不给你发粮票，你要饿饭的！”

这口吻让我受不了，好像我不是“按劳所得”，而是受恩赐。我马上想到解放前作家庭教师时，第一次伸不出手接家长那个装有薪水的大红信封，还是人家说是劳动所得，我才以“劳动换饭吃”的自我安慰收下的。我毫无畏惧地回答：

“饭早就饿过了，一时半会儿饿不死的。”

我转身就走。我听到他在我身后咕噜了句什么话，然后“哼！哼！”的冷笑声在我身后传来。是的，这就是1956年刚开始实行粮票制时，我亲身经历的一个威胁。那时在街上买个饼也要一二两粮票，但我顾不了这个。回到学校拿了我箱子里剩下的钱，连一件换洗衣服都没带就去长途汽车站买了第二天一早到昆明的票。到昆明已夜里九点钟，我去找好友张崇基。从17岁起我就是个无家可归的人，现在能关心我的只有她一人。她见到我高兴地问：“放假回来了，我们又可好好在一起聊聊玩玩了！”她当时在教师进修学院教书，也放假了。吃了她给我拿来的点心休息休息后，我将详情告知她，她对此感到很气愤。

见中官——豁出去

我在张崇基家住下了。第二天她陪我去昆华医院看眼。检查完毕后，医生说，眼底模糊不清，充血和网膜水肿厉害，好像视网膜脉络

膜都出了问题。那时昆明医疗条件也还较差，没有较精密的检查仪器。他说，首先是目前绝对不能用眼，先休息一段时间，服些药及滴眼药水看看。我问要休息多久，他说至少三个月，搞不好半年后也不能工作。我急了告知他，我只有一个月寒假。他说只好请假了，然后给我写了检查证明和假条。回去的路上我和崇基商量后，决定第二天就去找省教育厅厅长。那时刚解放不久，见省官儿们还不太困难。见到厅长后我给他看了医生证明，向他报告了详情。这位官比那位地委的官好一点的是，他耐心听我讲，这给我带来了希望，我心想，也许这位年纪长一些不会有那么大的火气，会很好地处理问题的。我最后说：

“医生建议休息三个月，一个月后就开学，那边的课请你们设法找人先上起来，等我眼好后就回去，那时可以两个人分上全校的 28 节课，可能好一些。”

“如果新去的只能代课一段时期，那么就暂时代一段时期就是。”我继续说。

这位厅长听我讲完后，慢条斯理地说：

“你必须赶快回原基层单位去，由他们决定让不让你休息。我尊重基层的意见。”

天哪！我真没想到得到的竟是这样的答复，但我这次却耐心地回答说：

“我的眼都快瞎了，还要来来去去的折腾？就因基层不讲理，我才抱着希望来找你这位上级领导的。”

“我们不能支持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他很坚定地说。

又一顶大帽子！我没顶撞他，因他态度还不算蛮横。

“不过不管怎么说，一个月的假期该是我自己的吧？至少我可以休息一个月，没必要马上回去。”我说完后转身走了。

我也不知该怎么办，心想，一个月后再说吧。

我仍每周到昆华医院两次。最后一次检查后医生说，情况发展不妙，好像眼底黄斑出血了。他建议我到外省医疗条件较好的大医院诊治，还说眼睛是最重要的，不能掉以轻心，搞不好要失明的，不过不

能太紧张，既来之则安之，一定要保持良好的情绪……我感谢他的好意，他却不知我现在的处境不能有良好的情绪……。

一个月的假期到了，我决定再去教育厅一趟。这次厅长大人对我下了最后通牒：

“楚雄方面来电话说，你不回去不发你工资和粮票。你还想到省外去就医，太天真了！没钱没粮票，你上哪儿！？你要吃饭不？你要考虑考虑利害关系，你——”

没等他说完我就顶了一句：

“首长，我目前惟一考虑的事是我快瞎了！”

我豁出去了！

见大官——告状

回到张崇基家我告知她情况后，她同时也可无可奈何地告知我，她丈夫的机关已知我在和教育厅“打官司”，认为把我这个无组织无纪律的人留在他们机关宿舍里很不恰当，要她劝我离开。她给了我 100 元钱（那时她的工资是 90 元）和一些粮票，叫我在外面街上买饭吃，不要和他们一起再在该机关搭伙吃饭了。解放后我第一次感到“走投无路”，难道忍气吞声地回楚雄？吃批评扣帽子我都不怕，怕的是我真的瞎了，后半辈子怎么活？谁来管我？！我陷入彷徨和迷惘中。不知怎的，我现在感到的彷徨并不像旧社会时的那么绝望。我坚信，解放后和解放前会不一样的，总会有可以声张正义的地方的。我向一位旧日的友人借了 200 元钱，说是急需用，不久即还她，她并不知我当时的情况。加上张崇基给我的 100 元一共 300 元可以走了。我买了第二天到沾益的火车票，想先到贵阳后再作打算。我心里暗想，或者可以到上海找母校求援并治眼，毕竟我在上海生活了三年，住过三次医院，不至人地生疏。

记得在火车上邻座的是两位三十来岁的一男一女，他们好奇地打量着我。我心里一怔，是否是认识我的人发现我“出走”了？然而女同志好奇地问我：

“上哪儿去？出差吧？”

我支吾着。她又说：

“你的脸色很不好，蜡黄，有病？”

男同志接着说：

“怎能派这样的病人出差呢？你应向领导说说另派人去，万一出事呢？”

“只是眼睛不大好，其他还可以支持，这差事还非得我亲自去才行。”我回说。也许当时大家保密性很强，他们也就没继续问下去了。他俩颇为同情地说，路途远，路上有事找他们相帮，不要客气。谈话中得知他们是北京高教部到昆明出差后返京的。知此情后我真想把我的满腹委屈向他们诉说，但我忍住了，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又多长了一点“心眼”，毕竟我不认识他们，也不了解他们。一路上多亏他们照顾到了贵阳，到贵阳后我突然想到要从重庆到北京告状去，那里是党中央的所在地！这两位从北京来的同志就是新中国首都领导机关工作人员的很好形象。对，到北京去！我本来想和他们同路去的，后来一想，到了北京高教部告状时会否露马脚——我向他们扯谎说出差，他们会认为我欺骗他们。那就到重庆后再转到武汉

北上吧。乘长途汽车到了重庆后，我叫了一辆三轮车拖着我去找旅店。跑了好多家都客满。不知为何那段时间船票很难买，很多旅客滞留在重庆。好容易在解放路上找了一家很小很小的旅店。老板娘说，三楼顶阁有个非正式房间放了一张床，很久不住人了，我如肯住，她去铺上席子拿床被单给我。也只好如此了，总比露宿街头好，有张床总可躺下，真太累了！

真不敢回想那一夜是怎么熬过来的？！老板娘打了一个灯笼带我走上咯吱作响的竹楼梯时，一群群蝙蝠突然一哄而起，迎面乱七八糟地撞到我身上，我吓得尖叫起来。老板娘说：“怕啥子？！你吹灭灯躺下就好罗。”她走后我赶紧吹灭了灯笼和衣躺下。这些该死的蝙蝠哪肯安静？整夜滑翔着来来去去地往我脸上身上乱撞，吱吱叫声不断，夜里正是它们捕食蚊虫的大好时光，哪肯停下片刻！我感到身上脸上脚上手上到处有什么在爬，痒痒的，用手一摸，左手抓到一个小虫，